谈谈民俗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鐘 敬 文

我很乐意来参加这个“民俗论坛”。因为这个民俗学的理论研讨会是同大量民俗文化的表演活动、民族文化的显示活动同时进行的。这在我们以前还没有过，因此很有意义。我作为这个行业中的一位老人，也很乐意借此机会，谈谈自己对于当前民俗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看法。

(一)关于学风与责任感

上午我们都看了旅游节的民俗表演，很精彩。由此也可以想到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实在丰富。有一些人看不起、甚至于蔑视传统的东西，以为那是累赘。这是不公道的，对不起我们的祖宗的。我们的祖宗在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许许多多优秀的东西，而且遗传到我们的时代，部分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而有些人却以为现在要“现代化”，那么，过去的这些东西越扫除得干净越好。这种想法从知识上来讲，似是无知或偏见；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那就近于不肖子孙了。我们是要现代化，但那是我们具有丰富文化遗产的中华民族去选择、鉴别、接受外来文化藉以强壮自己，而不是要以它来消灭自己祖宗传下来的一切文化。

我们因为以前比较封闭，开放之后，外国理论象潮水一样涌进来，美恶混杂，年轻人不免有些分辨不清或饥不择食。有的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对外国理论所知甚少，又急于胡搬乱用；有的在写作上还要乱啃大题目。我总觉得这样做法是不大合适的。一切的理论，都有它适用的范围，有它的局限性。比如用弗洛依德等的理论去研究“荤故事”也许是很确当的。但若要从一切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去找“情结”，那恐怕不行吧。所以，在取舍上应该注意！我作为一位老学者，有责任指出这点并予以警告。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他的传统的，那就是他对社会、对民族、对历史的责任感。古人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像我们都知道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很多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也知道那样做未必成功，但他们为什么还要那样去拼命？那就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中华民族，如果不推翻当时的统治者，就没有前途。正是在这样的心情、志向之下，他们才去送死的。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虽不必像他们那样去抛头颅、洒热血，但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民俗学事业，也要有责任感，而不要拿事业做个人进身的敲门砖。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方能真正兴旺。要完成一项事业，总要有牺牲（时间、精力、金钱等），结果才会有成就。今天，我们的民俗学队伍已比较壮大。我希望在这样的队伍里，大家要有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感，端正学风，搞好这门学问。这样做才能对得起古人，对得起来者。

（二）应用也需要研究

来参加今天这个讨论会的同志，有侧重搞民俗学基础理论的，有侧重搞民俗学应用的，尤其是旅游方面，我想这些都是可以的。不过有的同志认为：只有搞基础理论的需要研究，搞应用的就用不着进行研究，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比如放鞭炮，在大都市里的确会产生一些危害，单从这一方面看，似乎可以禁止它。但从我们民俗学的角度看，这却有着更深的意义：它与人们求安全、

求幸福的信仰心理密切相联。如果要禁止它，那就要全面分析，它的利与弊在什么地方？如何处理它才更为合适？听说禁放鞭炮以后，有的地方出现了改用能发出鞭炮声音的电产品去代替它。这说明鞭炮的声音是怎样与人们的心灵联在了一起的事实。对待这样的民俗事象，如果不研究，而冒然加以简单的处理，结果会合适吗？再比如对宗教信仰，也不能简单地一口斥之为“迷信”、“鸦片”就了事，还要看到它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事实，要认识到它在人类生活中曾经起着一定的作用。所以，无论是搞基础理论还是应用，都需要科学地进行研究。不然，弄不清对象的性质、历史与作用，应用往往会无效甚至犯错误。这个问题，过去一再发表过意见。现在趁此好机会再一次提到它。希望能引起同志们的重视。

（三）‘历史民俗学’的成立

“民俗学”,在我看来,应该说是‘民俗诸科学”,就是说它里面可以包涵很多分支学科，比如民俗理论、民俗史、神话学、故事学等等。这次的民俗研讨会中，有位同志提出可否建立“历史民俗学”的问题。我以为这是可以的。问题在于处理的是不是历史民俗现象，或者是否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考察民俗现象。如果有上述两种情形，那么，这种支学就可以成立。历史民俗学，应当包括古代民俗志、民俗史、民俗学史以及其他有关著述。它与神话学、故事学等一样，可以成为民俗学的一个支学。现在日本有一些学者，主要从历史角度去探讨民俗，自称其所著书为《历史民俗学》。他也被称为“历史民俗学家”。现在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学者，将来学科发展了，也许自然地要出现吧。

（四）民俗学的意义与用处

过去曾经有人问过我‘:你们的民俗学,尽搞‘破铜烂铁’,到

底有什么用？”在今天社会“现代化”的大潮冲击下，也会有很多人在想这个问题吧。昨天的讨论中，就有同志提到这个问题。老实讲，这个问题在我的脑子里也反复想了很久了。我觉得，在这个“有用”与“无用”的问题上，要有两个方面的分别：第一，物质的与精神的分别；第二，现时的、个人的利益与长久的、民族的利益的分别。从长远的角度看，民俗学的知识对于人类精神的养育、视野的开扩，是有用的。它要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中找出某些规律来，把要散失、消亡的东西抢救出来。这些就是有意义、有作用的。但如果要拿它去发展经济、创造物质财富，就不一定会有较大的作用了。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一种学问自然有其“应用”的问题。但在研究工作之前，最好还是不要先想到“有用无用”、“如何应用”的问题（记得有位革命大师就说过跟这类似的话）。最好先进行研究，然后再去谈研究成果的应用。比如我们现在研究宗教信仰，如果你心里先想着这是为了铲除迷信进行的，那么，你的研究工作结果的准确性、客观性就会受到影响，或者只是片面的结论。

（五）民俗学研究与民俗事象不能相等同

目前在农村，传统风俗习惯变化很大。不过总的看来，物质的文化（如吃、穿、住等方面）变化较快，而那些沉淀在人们头脑、心灵深处的东西，变化就不那么容易。所以，对于民俗事象的变化，我们要有分析、有辨别地看。其次，民俗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但我们的科学工作是进行客观的研究，不能等同于民俗文化本身。民俗事象变化快，我们的研究不能也跟着变化快。那是不合理的。因为科学本身是相对稳定的。所以，要弄清楚：理论研究与所研究的对象虽然有联系，但不能等同起来。否则就可能出差错。比如有人问：你研究的东西都要消失了，你的工作还有

什么意义？这就是没有分清研究工作与它的对象是不同的。我们都知道，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全是属于过去的东西，有的还远在人类文化的萌芽时期。但考古学的存在，却有它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又如民间文学，假如说它将来都消失了——当然这只是一种比方的说法——但民间文艺学还是可以存在的。因为还有那么丰富的被记录下来的东西可供研究，应该研究。明白了这一点，无疑是有益于我们的民间文化研究工作的。

在民俗学的研究工作中，还有其他的许多问题，比如说进行某一专门课题的研究，不仅应掌握多种学科的知识、以及一般民俗学的理论方法，同时还必须具备大量的、有关问题的专门知识。这就是一个例子。限于时间，我这里就不多说了。谢谢大家。

1995年5月于京郊门头沟

（杨利慧根据录音整理，并经鐘老审阅）

※：本文是据鐘敬文先生在“首届中国民俗论坛”开幕、闭幕式上的讲话，经择要综合整理而成。题目为整理者所加。 ——整理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关于民俗学的研究方法

马 学 良

（一）

这次的会组织得非常好，新人辈出，很多论文也提高到 新水平。

民俗学是个多科性的学科，这次与会者有民俗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民间文学家以及语言学家。从会议的组织者这次邀请的专家学者来看，正体现了民俗学的性质，因而才能组织起这次别开生面的有新内涵的民俗学讨论会。

我认为中国古代有两位先导，一位是最早作历史民俗调查的西汉时期的司马迁，为了写《史记》，足迹遍全国，曾“西至空峒，北过逐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所到之地“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可见史料的来源是通过各地长老传述得来的，尽管他认为历史不等于民俗，但在文献缺少的地方，不得不“网罗天下散佚旧闻”“立俗施事”。《史记·五帝本纪》就是从各地长老传述来的。第二位是西汉末年的扬雄，他是我国第一个搞语言实地调查的人。为了研究古代的文献典籍，“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走访民间,博采各地方言,用了 20 多年的时间；编著了一部《方言》，成为我国语言文字史上的宝贵遗产。这二人算得是我国历史民俗和语言文字实地调查研究的两个第一，也是历史民俗学、语言文字导开先路的先行者。

因为民俗学是多学科的，所以搞民俗研究的人一定要博，要懂得社会科学和语言科学，如长沙马王堆发掘出土后，要考证里边的东西，就需要有民俗、考古、历史、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而语言是社会现象，又是搜集整理民俗资料、民间文学的重要手段，从语言中所反映的社会现象是我们研究民俗学的重要材料，因此，语言学对研究民俗学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尤其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中，不了解民族语言，就无法收集到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在比较研究中就不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

民俗是社会的产物。因而它包罗万象，譬如占卜，各地民俗都有这类东西，不但要研究地上的，还要研究天上的，如研究星座与人的生活关系，用日月星辰神话指导农占、祈雨和预言人事活动的民俗。所以，研究民俗要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才能使民俗学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

（二）

我与鐘老相识几十年，仍是个小学生。鐘老 90 高龄，为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奋斗了一生，成就辉煌，而且培养了许多卓有成就的学生。

刚才听了鐘老的讲话，说出了他的肺腑之言，担心来者之不如今，言近旨远，发人深省。从而使我们更加理解鐘老对后一代辛勤栽培，对学生严格要求，惟怕其不成材，发出恨铁不成钢的激情。古有名训“弟子未必不如师”，弟子应当比老师高，一代更比一代好，这是大多老师所希望的，也是事业发展的好势头。

我们的民俗学在老一辈学者苦心孤诣的经营下，走过了大半个世纪坎坷的历程，已跻于世界先进科学之林，尤其近十年来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后，在鐘老领导下做出了很多发展民俗学的业绩，出了许多有关民俗学的文章和科学论著。鐘老对学科的建设尤为关心，带领他的弟子，并聘请国内外名流，举办学习班，并孜孜

不倦地亲自讲授，培养出一批批的新人。他对民俗事业的勤恳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我搞民俗调查，是解放前在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时，去民族地区搞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工作时开始的。不了解民俗，就无法理解语言的内涵，因而做了些民俗调查工作。反之，不懂得所调查的民族的语言，也很难收集到较完整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当时为调查语言收集的一些民族风俗资料，我曾发表在《西南边疆》、《边政公论》等刊物上，那是些浅薄、微不足道的素材，谈不上是民俗学，只能说是我对民俗学研究的开端吧。这些年，有幸与鐘老在一起，对民俗学有了较深的了解。我认为，对民俗学研究，今后应结合语言学下去搞田野调查，运用一种记音符号记录民间故事、传说之类，翻译整理出来，既可保留故事的原貌，又可做为研究神话传说的可靠资料，鐘老称这种研究成果为“科学版”。不提倡那种听听故事概要，就任意加工拓展成华而不实的长篇。民俗学研究的面应大一些，宽一些，在可靠资料的基础上提高理论方面的研究。虽然现在提倡各学科要有社会效用，因而各色“应用××学”应运而生，这是必要的。当然，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既要看到目前的效用，又要考虑长远的利益。总之民俗学研究的作用不是一两年可以奏效的。

民俗学研究，鐘老是老前辈了，对于学生和后辈学者，希望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学生首先还是应该好好跟老师学习，学习他们坚毅不拔的治学态度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

最后，感谢几天来大家的发言及论文，对我的启发很大。感谢会议的组织者，给了我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1995 年 5 月 30 日（范慧娟记录整理）

民国时期的妙峰山民俗研究

——纪念顾颉刚等人的妙峰山进香调查 70 周年

吕　威

妙峰山在京西 80 里，是北京一带的香主，山顶庙祀的神是东岳大帝的女儿“天仙圣母碧霞元君”。过去，每年的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朝山进香的人非常踊跃，尤其是初六、初七、初八这三天，每天去的人有好几万，除了京兆之外，天津及保定来的人也很多，旅京的南方女子亦不少，届时有各种团体组织为进香的人提供各种服务。于是，妙峰山庙会成为京西的一大宗教民俗景观，自明代建碧霞元君庙以来，400 年间香火不断。随着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兴起，妙峰山庙会的民俗活动开始引起学者的注意。民国时期，一些民俗学家和社会学家曾先后数次对妙峰山庙会开展实地考察及文献研究，这些考察和研究曾经有力地推动过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因此在顾颉刚等人的妙峰山进香调查 70 周年以及中国民俗学面临世纪之交的发展选择之际，回顾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这一重要事件，并站在民俗学今天的学术高度对其得失予以重估，就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对妙峰山民俗的调查

（一）1925 年顾颉刚等人的第一次妙峰山进香调查

妙峰山民俗调查是与顾颉刚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开展

对妙峰山民俗的研究，顾颉刚当年做出了特殊的贡献。顾颉刚是如何想到要对妙峰山民俗进行研究的呢？对此，顾颉刚于 1929 年 12 月 25 日为奉宽《妙峰山琐记》（详后）一书所写的《序》中有所记述。

顾颉刚是 1912 年到北京的，1920 年在北京大学毕业，但这最初的 9 年当中，妙峰山进香的民俗并未引起他的注意。那时每年一到阴历三月，去妙峰山进香的各种香会的会帖就贴满了全城，而顾颉刚对这些黄色的纸张视而未见。 1920 年秋天，顾颉刚和陈万里游西山，注意到去妙峰山路上的一座座关着门的小庙，问驴夫，说是茶棚。1924 年顾颉刚与吴缉熙再游西山，正逢阴历四月初八妙峰山进香的季节，4 年前关着门的小庙（茶棚）一个个都开了，进香的人非常之多，茶棚里的人击着磬、唱着喝茶喝粥的歌、磕着头，于是贴满京城的各种香会的会帖开始进入了顾颉刚思考的领域。顾颉刚回忆说：“忍了一年，会帖又出来了，这个好奇心再也不能制止，就请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先生派我们去调查。”承沈兼士先生的允可，顾颉刚等人得到了 50 元的调查经费（“自从北京大学提倡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以来，始终受着财力的束缚，正式的调查工作大约只有这一次。这一次的调查经费仅仅领到 50元，所以调查日期也仅仅容许三天。”——顾颉刚《妙峰山·自序》），于是就有了中国民俗学史上的这一次著名的实地考察。

1925 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顾颉刚、孙伏园、容庚（希白）、容肇祖（元胎）、庄严（尚严）一行五人受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的嘱托，从 4 月 30 日至 5 月 2 日(阴历四月初八至初十），对妙峰山庙会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民俗考察，回京后，参加考察的人每人写了一篇调查报告，因考察人员中的孙伏园那时正任《京报副刊》主笔，考察记就在京报副刊上发表出来。京报副刊为此从 1925 年 5 月到 8 月先后出了 6 期“妙峰山进香专

号”,即：5月13日147号；5月23日157号；5月29日163号；6月6日171号；7月17日210号；8月27日251号，历时四个月。因为北京大学经费太艰窘，这些报告文字当时没有出版的可能。直到1928年9月这些文章才和顾颉刚收集到的其他几篇讨论妙峰山进香的文章一起，以《妙峰山》为题，作为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丛书之一结集出版。

《妙峰山》全书共收录文章29篇，这29篇文章，无论从当年当事人的眼光，还是从今人重读的立场来看，都不能不承认最有份量的还属顾颉刚的《妙峰山的香会》一文。正如李景汉在《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详后）一文中所说：“几篇妙峰山的著作，尤以顾颉刚先生的香会一篇为最有价值。”

《妙峰山的香会》一文反映了顾颉刚独到的调查与研究方法，说来也简单，顾颉刚的方法主要是抄录各种香会的会帖，他的文章也主要是通过分析所抄录的近百张会帖写出的。因此，抄会帖就成了顾颉刚本次妙峰山民俗调查的主要工作，对此顾颉刚有生动的回忆：

“我在北京住了也有八九年了，这些会启（顾颉刚为会帖起的专名）年年张贴，但以前的七八年中竟毫没有投入我的意识。自从去年（1924年）5月11号（阴历四月初八）游了一次三家店，看见了几千个香客，进了几个茶棚，方始在我常走的几条街巷中见到墙上贴着的无数会启。我的心中顿时痒得很，恨不得把这些东西立刻抄来，但又老不出脸皮当着许多走路人的面前抄写。不久风吹雨打，加以惜字人的揭取，也就看不见了。这次到妙峰山，我立下坚强的志愿，要抄录一个全份。抄录会启是从来没有的事情，所以一班香客都很注意，他们聚着看我。我本来很怕羞，更经不起他们的注意；要不是受了压抑了一年的好奇心的逼迫，一定是羞怯得写不下了。现在居然把它们抄完，虽是有许多节录得太简单，总算得到了一个大概情形，我真是非常的快乐！”（《妙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山的香会》）

通过抄录会帖，顾颉刚统计出本年度 99 个香会的名称及其地域分布。从会帖和碑碣的文字中，顾颉刚还分析出各香会会费的募集方式及香会的会规、组织结构。对香会的分类也是通过对会帖及碑碣的分析得出的，主要有：修路、路灯、茶棚、缝纫、成补铜锡器、呈献庙中途中用具、呈献神用物品及供具、施献茶盐膏药、技术、普通的进香及未详其意义者 12 大类。

当然，顾颉刚也十分注意将抄录的文字材料与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素材加以比较，比如，起初顾颉刚以为只要抄录了全部的会帖，就可以掌握所有香会的数目，到实地一看方才明白，许多香会是不贴会帖的，因此仅靠抄录会帖是无法了解香会的确切数目的。根据抄录的会帖的数目及从茶棚中了解到的材料，顾颉刚断定，本年香会的数目在 300 以上（顾颉刚从一个茶棚人口中得知，妙峰山香火盛时，香会数量可达到 400 余）。

又如，当顾颉刚从他人处得知，“一个香会必须经过了一百年，方可改‘圣会’为‘老会’’，时，他由此得到启发，在种种香会之中约略分出其先后来，并从会帖和碑碣中发现了 23 个 100 年前发起的香会。

70 年过去了，今天重读顾颉刚的《妙峰山的香会》一文，我们依然认为：无论就方法的独特，还是就分析的缜密而言，该文都是难以企及的典范，除了奉宽的《妙峰山琐记》，至今还没有一篇研究妙峰山进香民俗的文章或专著能够与之媲美。

顾颉刚等人的文章在《京报副刊》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和学界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一些人给顾颉刚他们来信，讨论妙峰山进香民俗；一些人写文章对他们的成绩予以肯定或提出中肯的批评。

（二）1925 年李景汉等人的妙峰山“朝顶进香”调查

在顾颉刚等人调查的同时，社会学家李景汉也对妙峰山香会

进行了实地的考察。考察后,李景汉撰成《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一文,刊登在当年 8 月中国社会学会出版、发行的《社会学杂志》第二卷第五、六号合刊上。 1928 年顾颉刚编辑《妙峰山》一书时曾想将其编入,但因“一时找不到”而未果(顾颉刚《妙峰山·自序》)。

李景汉的妙峰山进香调查是应美国人甘伯之约前往的。甘伯是《北京社会调查》的著者,1924 年香会期间,他曾上妙峰山游览,次年,他决定再次前往,并约了两个美国朋友同去,因言语不通,就又约了李景汉一同前往,李景汉也正有此意,两下一拍即合。

与顾颉刚等人一样,李景汉等人的妙峰山进香调查也是前后三天,只不过比顾颉刚他们早了两天,李景汉一行 4 月 28 日(阴历四月初六)启程,第二天登顶,待 4 月 30 日(阴历四月初八)返回时,顾颉刚他们才刚刚出发,因此顾颉刚和李景汉这两位中国民俗学与社会学的先驱人物错过了在妙峰山上遭遇的机会。

李景汉在撰写《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一文时,《京报副刊》正在连续发表“妙峰山进香调查专号”,李景汉的文章中提到了“《京报》的五月副刊”中刊登的“几篇妙峰山的著作”,认为“尤以顾颉刚先生的香会一篇为最有价值”,并引用了顾颉刚和容庚文章中的不少材料。

大概是因为陪同外国人的缘故,李景汉的这次调查不十分细致和周到。所写的调查文章基本上由两方面的材料组成,一部分是李景汉个人的见闻;一部分取材于容庚的《碧霞元君庙考》(收入《妙峰山》一书)和顾颉刚的《妙峰山的香会》。

据李景汉说,他在去妙峰山的路上也抄了 60 几个不同的会帖,后看到顾颉刚竟抄了 99 个,于是就在文章中主要介绍了顾颉刚的考察与分析。

李景汉的文章在当时没有产生像顾颉刚等人那样的影响,个

中原因可能是：第一，《社会学杂志》是一本学术刊物，不如《京报副刊》在群众中发行量大；第二，顾颉刚等人的文章发表在前（5 月即开始断续发表），李景汉的文章发表在后，又没有提供更多的新材料。

（三）1929 年顾颉刚、魏建功等人的第二次妙峰山进香调查

1929 年 5 月，已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回到北京，与魏建功、白涤洲等人组织了“一八妙峰山进香调查团”，对妙峰山民俗进行了第二次有组织的考察。这次考察团的成员有：白涤洲（总指挥）、魏建功（天行）、顾颉刚、罗香林、周振鹤、徐炳昶（旭生）、朱自清（佩弦）、容媛（女）、朱保（杰）雄、葛毅卿、王碧书（女、魏建功夫人）、王氏（侯惠贞？女、魏建功国太）、王义诠（魏建功国舅）等 13 人。

考察团 5 月 17 日（阴历四月初九）出发，5 月 19 日（阴历四月十一）返回。

考察途中，顾颉刚就为每个人派定了考察记的题目，因此这次考察的成果就又有了一期“专号”出版。这就是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 1929 年 7 月 24 日出版的《民俗》周刊第六十九、七十期合刊《妙峰山进香调查专号》，共收录文章 9 篇，附录 3 篇，书前有魏建功等人拍摄的照片 36 幅及文字说明（文章中还有多幅照片及插图，未作统计）。

与 1925 年的专号相比，这次专号上的文章虽然数量减少，但文章所讨论的问题却更加细致、具体。如罗香林的《碧霞元君》与容庚的《碧霞元君考》相比，同是讨论碧霞元君起源的问题，后者只有 11 页，前者却长达 67 页，引用材料也丰富得多。周振鹤的《王三奶奶》也是一长篇论文，共 40 页，同时还附有一些照片、示意图、描摩的图案。

与容庚的《碧霞元君庙考》相比，罗香林的《碧霞元君》一文不仅考察了碧霞元君的起源，而且讨论了碧霞元君的功能，人

们迷信碧霞元君的原因，泰山碧霞元君与妙峰山碧霞元君的区别，碧霞元君与中国古代女神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是一篇全面研究碧霞元君的文章。罗香林考察了碧霞元君起源的四种说法：东岳大帝女儿说、黄帝七女说、华山玉女说、民间凡女得仙说；并引唐·刘禹锡诗证明唐代已有“元君”之称。除了文献资料，罗香林也使用了不少田野资料，如碧霞元君的功能，就是通过分析各香会给碧霞元君上的表文中的祈求之语和 53 种‘圣母签’的正文及“解曰”、“诗曰”两种释文得出的。

《王三奶奶》一文为我们留下了正在变化中的民俗的一个生动的例证。与四年前顾颉刚等人留下的记载相比较很能令人得到些启发。

先看 1925 年的记载：“娘娘正殿的右手有小间一，供王三奶奶。青布的衫裤，喜鹊巢的发髻，完全是一个老妈子的形状。”（顾颉刚《游妙峰山杂记》，收入《妙峰山》一书）

再看 1929 年的记录：“大殿西边露台下，有一个偏殿；黑地金字横额写着：‘慈善引乐圣母广济菩萨宝殿’。这里供的那位菩萨，俗称王三奶奶。王三奶奶的装束，已不像《妙峰山》里说的‘老妈子’模样，一变而为菩萨了：头上戴着凤冠，身上批着黄色华丝葛大衫。她左边是手里拿着一支长杆烟筒的侍者，她右边是手牵一匹黑毛驴的驴夫。镜框里嵌着一张丁卯年摄得的六寸半身的灵魂（真容）照片。”周振鹤还从庙祝手中得到了一本京师商务公议、总商团会长孙文泉为还愿印送的《妙峰仙山慈善圣母王奶奶平安真经》（又称《敕封妙峰仙山灵感慈善引乐圣母历史真经》）。从“真经”上我们得知，王三奶奶于“民国十四年降北平吉祥经法宝室鸾坛；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寿辰，玉帝赐黄袍履；十六年冬月十九日正午，在北平正阳门外西皮条营贯妙山弟子家显化照像，奶奶不惜百年之道，以满众生之愿。”据此可知，妙峰山碧霞元君庙中王三奶奶神格的升级即发生在民国十四年到民国十八年的四

年当中，甚至有可能这四年也是整个京津地区王三奶奶信仰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周振鹤为我们留下了变化中的民俗的极其重要的历史记录。

魏建功、顾颉刚等人的第二次妙峰山进香调查尽管没有产生如第一次那样的轰动效应，但调查者无论在民俗学、宗教学理论的掌握上，还是在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上，都较前一次为成熟，从而将中国民俗学的田野调查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二、研究妙峰山民俗的专著

(一)奉宽的《妙峰山琐记》

顾颉刚对《妙峰山》一书曾经十分自负，他说过：“这本《妙峰山》真是可以宝贵了：我们这件工作总算抢到了一些进香的事实，保存了这二百数十年来的盛烈的余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有人批评这本《妙峰山》编得不好的时候，我总回答道，‘这是仅有的一部书了!这不是编制的好坏的问题,乃是材料的有无问题!’我常想，能够注意这个问题的，怕全国只有我们几个人吧？我们调查的固然不详细，但比我们详细的还有谁呢？倘使我们不作这一次的调查，将来这件事情消灭了之后，再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人知道那些情形呢?”(《妙峰山琐记·序》)

容肇祖也有同样的说法：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民俗周刊已出了 28 期，但“最详细的调查和带研究性的记录”“在当中找不出第二本妙峰山来”。(容肇祖《妙峰山序》)

顾颉刚没有想到，世界上的确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他在顾颉刚等人之前，就已经对妙峰山进香民俗进行过长期的，也更为详细的调查研究，正因为如此，当顾颉刚看到了他的著作之后，真是喜出望外而且大为叹服了，这个人就是奉宽，大作名为《妙峰山琐记》，1929 年 12 月，作为国立中山大学民俗丛书出版，(钱)玄同题写了书名。

在该书的《序》中，顾颉刚追记了这本书的出版过程。民国十八年(1929)5 月，顾颉刚回到北京，与魏建功等人二上妙峰山，其间在容庚处偶然发现书架上竟安放着一册《妙峰山琐记》的稿本。“拿来一看，其中讲地理，讲古迹，讲风俗，讲道路，讲庙宇，都非常精密，而香会一项比我们所抄的竟多出了两倍余，尤出我的意外。把我们出版的《妙峰山》和它一比，显见得我们的质料太单薄了。我惊奇世上竟有这样一本正式研究妙峰山的著作；我又欣喜世上竟有这样一个注意民众信仰问题的学者！”据容庚说，书的作者是满族人奉宽先生， 50 多岁。该书完稿于民国十五年(共和丙寅、1926)8 月 24 日，大约是看了《京报副刊》上的“妙峰山进香调查专号”后，就把书送到燕京大学，希望大学能替他出版，但未能如愿。顾颉刚得知后，说：“那好极了，可以让给了中山大学的民俗学会了！”于是顾颉刚征得中山大学的同意，将该书收入了中大的民俗丛书。

作者奉宽，自号小莲池居士，满族人，生卒年不详。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首次奉母朝觐妙峰山，1914 年以后，他又连年与妻、子同去。“由于他有了这三十余年的见闻和经验，加以他的浓厚的历史兴趣，到处寻访古迹，一碑一碣都经过他的摩抄，所以他讲得头头是道，引用书证物证数百种，一丝不苟。”顾颉刚说：“我们从前去调查，见了材料就抄，自以为已很精密。但一方碑，一张帖，文字太多时，我们只有摘要写下，因为全抄了费时太久，而且围看我们抄写的人来了一群也有些不耐烦。今观此书所录材料，几十字的固然不缺，几百字的也不加刊删；一件东西的行格、尺寸、地位记得一丝不苟。这才是正式的调查！这才是调查的形式，因为这样，所以（进香）路上的茶棚名目，会帖，及其废兴的情形，他都能记完全了；妙峰山及其附近的庙宇，村庄，碑碣，塔像，风景，也都能记清楚了。他不冀奖励，不畏穷饿，随着自己的兴趣，对于某几个问题作为数十年的专政，这真是我们学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